

边尘不惊：

日据时期马来亚边佳兰地方华人的战时生活与地方发展*

莫家浩**

I. 前言

II. 战时生活与粮食问题

III. 产业发展与公共建设

IV. 小结

■ 摘要

在马来亚与新加坡，三年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无疑是个苦难时代，老百姓蒙受了巨大的性命与财产损失，更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战时记忆，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魂牵梦萦。本文透过梳理来自不同叙事主体的战时经历与档案文献，探讨马来亚的柔佛边佳兰地区华人在1941至1945年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中如何自处，并通过对日据统治下当地的产业发展变迁的爬梳，重构战争对边佳兰华人社会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边佳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与产业形态，致使当

* 本文初稿发表于马来西亚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举办的马来西亚华人地方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年8月20-21日)。

**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管委。

电子邮箱：bakjiahow@gmail.com。

地华人很大程度上逃过了屠杀与饥馑的厄运, 日据时期在当地的基础建设及矿业开发, 也间接重塑了当地的产业发展方向, 奠定战后初期边佳兰的社会与地方格局走向。

关键词：日据, 马来亚, 边佳兰, 华人, 战时, 发展

■ Abstract

All Quiet on the Frontier :

Wartime Livelihood and Lo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 Pengerang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BAK Jia How

(Johor Bahru Chinese Heritage Museum, Malaysia)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the three-year and eight-month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was undoubtedly a time of suffering. The common people suffered hug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and left many evocative wartime memories, which are still lingering on our lan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he Chinese in the Pengerang area of Johor to coped with the Pacific War that broke out from 1941 to 1945 by examining their wartime memories and other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different narrative subjects, to review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engera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engerang,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industrial forms, caused the local Chinese to largely escape from the fate of massacres and famines during WWI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loc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opening of new mines had indirectly reshaped the trend of the local pattern which can be found 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changes in Pengerang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Key-Words : Japanese Occupation, Pengerang, Chinese, Wartime, Development

I .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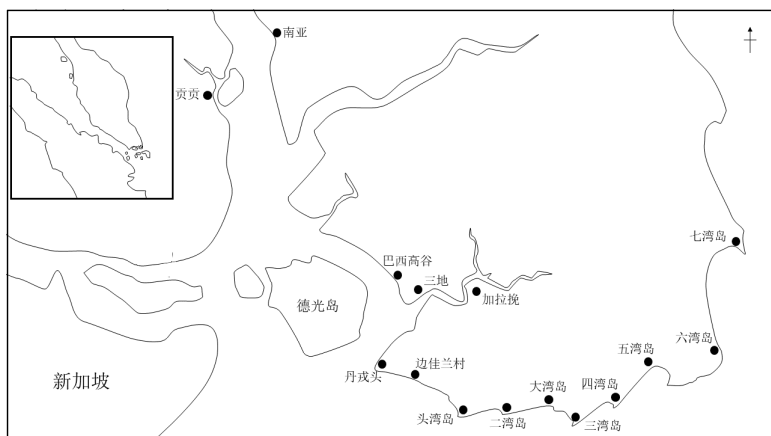
1941年至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无疑是人类历史的惨痛经验。历年关于马来半岛柔佛一带日据时期苦难记忆的描写，积累至今，亦可谓汗牛充栋(吕少雄. 1999；赖益盛等.2007；林博史. 2007；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大战与南侨》编纂委员会编. 2007；萧依钊.2014；郑昭贤. 2018)。而事实上，就在大战结束后不久，1945年12月29日，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刊载了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稿件，题为〈光复后的边佳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立场鲜明，文章仍述及日据时期当地的采矿与垦殖活动，户口调查、有偿劳动以及公路铺设等治理行为：

“石原产业株式会社，是日本后起财阀之一，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南侵胜利想在他们日本财阀界争地位，在南洋图霸业，和「三菱三井」等财阀争衡，因此大规模在边佳兰经营各种业务，招牌挂着「石原产业南岸矿山株式会社」，其最注意者也就是采矿和开辟农场，施行种种奴役人民方法，调查户口，强迫人民服役，每人一天配给四两米，几角钱蕉币，从早晨到傍晚，食粮不足，当然疲乏，偶一疏忽，鞭打随之，就是小童也要替他做工否则认为坏人，建筑公路以利交通及矿产运输，从边佳兰丹容头经头湾二，三，四，六湾筑成了阔三十余英尺，长十余英里的公路，在加拉挽，四湾及三地巴西一带开辟了五六千英亩荒芜的原野，成为肥沃的农场，可是这蜿蜒的公路，广大的农场，却不短费尽了多少人的血汗力量，死亡了千百的群众而造成的。”

(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1945.12.29, 3)

边佳兰(Pengerang)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Johor)境内，地处马来半岛东南一隅，与新加坡隔海相望(参见图1)。自19世纪起，华人移民便开始在其绵延30公里的海岸线及内陆山林拓殖。由于陆路交通不便，当地长

期依靠水路与外界联系(莫家浩, 2021)。若按〈光复后的边佳兰〉一文所述, 战时边佳兰的境遇似乎并非只有残暴不仁, 同时也兼具了公共建设与产业开发要素。有鉴于此, 本文透过梳理关于边佳兰当地的各种战时记忆及史料文献记录, 既与主流历史叙事进行比较, 同时也将进一步探析战时经验对于战后当地产业发展的影响, 藉此重新审视战争对边佳兰地方发展格局的形塑。



〈图一〉边佳兰地区及周边主要聚落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谷歌地图及实地考察所得绘制。

II . 战时生活与粮食问题

1942年2月15日, 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 象征著作为太平洋战争一环的马来亚战役, 以日军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要迟至2月下旬, 日军方才进驻边佳兰, 正式开启当地长达3年半的日据时期¹⁾。值得注意的是, 日军进驻边佳兰, 并不意味着当地就此进入军事管制。虽然日本

占领当局将马来半岛的吉打、霹靂、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吉兰丹、丁加奴、马六甲、柔佛、彼南(檳城)10个州和1个昭南特别市(新加坡)归入马来军政监部管辖下,然而对于柔佛州原有的政府行政架构并未有太大的更动,尤其在地方行政治理方面,几乎与此前的英殖民时期并无二致。(Ghazali bin Mayudin. 1978, 20-25)。因此,日据时期的边佳兰,在地方行政层级上依旧归哥打丁宜县管辖(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01/02)。

纵观日据时期的边佳兰,至今尚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说明边佳兰当地曾经发生过肃清屠杀或“三光”政策等日军暴行。至于当地日本士兵的扰民行径则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向老百姓索要牲畜²⁾。例如当时边佳兰华人富商刘振标的子女所忆:

“日本兵来时,多的时候来八、九个人,少的时候来一、两个人……这时,家里年轻的女人和男人赶快放下手中的工作,奔到上厅后面的窄廊里,那里有几块活动的木板,抽起板就可以钻出屋子,逃到屋后一人多高的草丛里……日本兵来了,看到的是一个良民模样不断哈腰点头的外公,两个一瘦一胖穿着黑裤蓝衣脑后梳髻的老太婆以及几个稚龄小孩。家里一个会说一点日本话的长工阿顺,就会恭恭敬敬地陪日本人到处看看。日本鬼总会咿咿哇哇指手画脚的要鸡要鸭。于是,阿顺给他们抓鸡捉鸭,如果日本人要鸡蛋,他就会把原本要卖的鸡蛋装满一篮,双手奉上。”

(朱亮亮.2010,100-101)

-
- 1) 当地华人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当时驻扎在边佳兰的日军规模只有10至20人(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赖涌涛@流军). 1 July 2008, Reel/Disc 1 of 15)。
 - 2) 日据时期只有3、4岁的赖涌涛,犹记得日本士兵来到住在森林边缘耕作的他们家里索求鸡鸭的凶恶模样(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赖涌涛@流军). 1 July 2008, Reel/Disc 2 of 15)。

除此之外，对于家中有年轻女性的刘振标一家而言，日本兵俨然又成了另一类威胁。当时27岁的刘振标长女刘丽卿，虽已作人妇且生了四个孩子，当听说日本人进村来找“花姑娘”时，也立刻将刚出生不久的幼子藏在怀中，盖上被，躺在床上装病。其年轻漂亮的女房东则跳进厨房外盛满雨水的大缸里躲避，等日本兵离开后，刘丽卿幼子已被捂得脸色发黑差点断气，从水缸里爬出来的女房东也差点透不过气来。刘丽卿的妹妹刘丽娴不仅年轻未嫁，又是边佳兰当时唯一到过新加坡念中学的女子，平时在家中都只能以邋邋遢遢的男孩打扮伪装，当听闻日本人要抓边佳兰读过书的女青年时，心想此次凶多吉少，只能连夜乘舢舨逃往新加坡避难(朱亮亮.2010,101-104)。

即便如此，日据事实上并未打断战前已在边佳兰沿海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边佳兰沿海村落华人在20世纪初逐步发展出一种包含经济作物种植与禽畜养殖相辅相成的复合型产业模式，1964年，《南洋商报》刊载了一篇名为〈抚今思昔话边佳兰〉的报道，记者宣称自己采访了边佳兰一位百岁老人有关当地的发展历程：

“人类最早抵达此地的时候，他们仍旧过着原始的打鱼猎兽生活，后来人们发现了这沿海一带产鱼丰富，大家便引亲荐戚的到此谋生活，当时，他们挥汗与这大自然中的动植物搏斗，披荆斩棘，慢慢的已将不可一世的野兽征服，占有了这个区域，逐渐的人口日繁，聪明的人们知道单倚狩猎捕鱼终难维持急增的人口生活需要，他们开始利用土地，种植椰子、菓子与树胶，这是该县今日椰园胶林种植的‘始祖’，那时候，这个地方根本就‘没王管’，人们喜欢那块地方，就可以自己选择开垦，这种自由择地开拓继续了很久，就是后来政府的土地法伸张施行到全国各地时，此地人们仍照旧援用先开垦植树，然后申请缴纳地税的方法，若按土地法令，这种行为乃属非法霸占与使用政府土地，法令上附有足够权力将有关者控诉于法庭的，但当时政府只有鼓励人们申请缴纳地税而

矣。因此，荒僻如七湾岛(Punggai)一带，都被当地先人开拓起来，变成椰林，华人的习俗，凡是垦地植树，当然脱不了饲养家禽家畜，盖植物乃依赖禽畜粪便来作肥料的，因此，一直到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紧急法令施行前。该县的陆地生产与渔业发展，可以称得上‘双管齐下，并驾齐驱’……”
(南洋商报.1964.2.19,13)

通过记者的笔调，这位不知名的百岁老人为后人讲述了一个属于边佳兰当地华人视角下的地方开发史。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渔猎与橡胶种植，在他的故事中，华人透过先占地、后交税的方式，在所谓最荒僻的地方开拓椰林并饲养家禽家畜，禽畜的粪便又成为植物的肥料，让陆地的生产与沿海的渔业成为当地“双管齐下”、“并驾齐驱”的产业双头马车。而上述产业模式在二战前夕应已发展成型，一如1932年的欧人游记中所描绘的边佳兰沿海景观：

“海边开阔的沙滩有椰林环绕，马来人与华人的亚答屋顶点缀其中；浅滩附近停泊了不少船艇，渔栅和袋网遍布海面，黑夜和涨潮期间，这些渔具的顶端仅微微露出水面，对来往船只的川行造成困难……在鸡岬(Tanjong Ayam)的矮崖上，伫立着三湾警岗……岬角后方的土地为华人所据，他们以鱼糟喂养家禽，将数以百计的鸭子赶往新加坡的市场……这里的浅滩没有礁石，便于船只停泊，在岬角内侧，盖了一批华人渔民的寮屋。在岬角上生长着椰树幼株，延伸到岬角的右方则是一小片高耸的椰子树……”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1932.10.7,1)

以刘振标为例，他所拥有的四座分布在头湾、二湾及大湾的鱼栅，在日据时期依然运作，收获也并没有减少。刘振标甚至还多聘请了4个人在海边养鸡、养鸭、养猪，另聘两个人掌船，负责将捕获的鱼

虾运到新加坡卖。负责掌管渔船的是刘振目标长子刘熙成，每天将鱼栅的渔获从边佳兰运到新加坡吊桥头(Elgin Bridge)的新巴刹贩卖(朱亮亮. 2010,105,109)。

因此，即便面对日军骚扰民生的压力，对于刘家来说，日据时期的边佳兰，其实与饥饿和贫困的景象相去甚远：

“除了担心日本人随时会来之外，边佳兰的百姓在日本占领时期，大都没挨过饿。许多人自己种番薯、木薯和蔬菜。海产也十分丰富，总有捕不完的鱼虾……那时，每天在二湾老家吃饭的有四十多人。家里的厨房用的是最大号的大锅大灶。在沦陷后期，边佳兰二湾的老家总是炊烟袅袅，显出偷安一隅的平静和安详。” (朱亮亮.2010,104、106)

从大背景来说，边佳兰沿海固有的渔业与畜牧业，在日据期间可谓极具价值。自1942年下旬开始，新加坡开始面对鲜鱼供应短缺问题，亟需从廖内群岛及柔佛大量进口渔获以填补(The Syonan Shimbun.1942. 9.26,4)。时至1944年，柔佛已俨然成为新加坡最主要的粮食来源地，当时的报章报导中，将椰干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残渣被描述为价廉物美的牲畜饲料，椰林则被认为是豢养猪只的理想场所。据说每天都有蔬果、薯类和鱼产，由柔佛供往新加坡(The Syonan Shimbun.1944.5.5,2)。

另一方面，在日据时期，日方在柔佛各县成立渔业组合(Fish Association)，其成员为各地持有鱼行牌照(Fish brokers license)、且拥有鱼栅的华人，并由日本人出任会长。渔业组合的任务是谋求以低价收购来自鱼栅及其他捕鱼活动的渔获，并将渔产以低廉的价格输入市场。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则是，优质的渔获都优先保留给日本人、医院及日军，剩下劣质的小鱼则以高价在市场上贩卖(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enior Civil Affairs Officer Johore File No. 6130/45)。这样的措施，不仅保障了鱼

栅及其他捕鱼活动在日据期间得以继续进行，同时实质供应不足也变相推高了鱼价，让原本只能当作饲料肥料的鱼脞也变得有利可图。

事实上，在3年8个月的日据期间，马来亚整体的粮食价格，尤其在白米、猪肉、鸡蛋、鱼类等栏目方面，正以3到5倍的幅度逐年飙升(Chin.1976,38-45)。但对于战前便在从事上述粮食生产的边佳兰沿海地带而言，凭借其自给自足的能力，一般村民的战时生活，纵使不如刘家来得富庶，亦不至于饥肠辘辘：

“市场上的生活物资匮乏，物价高涨。村民大都买不到或买不起米粮，惟有以木薯、番薯及番薯叶子当主粮。一握米煮一大锅稀饭，木薯或番薯间白色饭粒成为点缀品……配上自家种的苋菜、蕹菜、韭菜等，就可以养家糊口了。渔民的家庭则可以把木薯番薯等粗粮搭配小鱼小虾，桌上的餐食都会比农家的餐食‘鲜美可口’……有许多贫困的村民，因为长期以木薯、番薯和野菜充饥，缺乏蛋白质而患上水肿症，面目和下肢呈现浮肿萎黄。尤其是那个时期的孕妇产妇都以木薯或番薯为主粮，缺乏肉蛋的蛋白质，导致营养不良，产后血虚面萎或浮肿的现象是常见的，有些村民会忍痛杀了家犬给产妇吃，以让产妇调补气血。（叶香.2019,14-15）

此外，一些在战前从事割胶的村民，也在日据期间改为种植粮食作物及饲养禽畜。居住在头湾爪亚坝的赖涌涛一家，原本以割胶为生。日据时期，赖涌涛的父亲与友人们以刀耕火种、截流引水的方式，在边佳兰内陆的不兰打地区森林边缘种稻。开辟田地后，赖涌涛一家便搬到这个后来被称作“新芭”的地方生活，与其他3户人家成为邻居。除了种稻，他们也在这里饲养猪鸡等牲畜。森林边缘虽然有毒蛇猛兽的威胁，但同时也可以捕捉到野猪、果子狸、松鼠、麻雀等野味填补餐桌(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赖涌涛@流军). 1

July 2008, Reel/Disc 1 of 15)。

另一方面，为了填补战时新加坡白米短缺的问题，1943年起，日军允许新加坡华人船主从泰国购买白米，并用船只运至新加坡。由于当时燃料亦匮乏，加上边佳兰与新加坡之间的海域尚布有英军设置的水雷（南洋商报.1941.3.20,31），这些运粮船主要以木造帆船为主，以物物交换的形式，向泰国人换去白米与其他粮食，运回新加坡后上缴给日本人（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Jack NG Kim Boon. 22 November 1983, Reel/Disc 4 of 10）。作为运粮船必经之地，战时边佳兰四湾成为米粮的转运点，进一步增加当地人获取米粮的机会：

“这时，头脑转得快的日本商人与边佳兰本地人成立了一个公司，名为“浪公司”，专门组织新加坡的舢舨船主，沿着马来亚东岸往北去暹罗湾买米。回程时，浩浩荡荡的一百多艘船，就在四湾下锚避风休息，等待有胆识的人，用电船或汽艇把大米一船一船的拖到新加坡去卖。因为当时，新加坡四周布满了水雷，商船都不敢靠近……俗话说，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答应拉米去新加坡的亡命之徒要求的报酬不是钱，而是要米。一个人要上五包十包米，马上就扛到四湾街市去卖。”

（朱亮亮.2010,104-105）

如此一来，战时的边佳兰人不但自带蔬果、渔获及牲口，在物资最匮乏的战争后期，甚至连白米都供应无虞，“边佳兰一带的人民，包括马来人，战时还能吃到白米。家家户户除了自己养牲口，也懂得屯粮。他们担心万一英、日两方又打起来，家里起码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粮食。”（朱亮亮.2010,105）。以上景象，也与日据时期身处边佳兰的其他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记录相契合（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CHIA Chore Seng(谢佐先). 24 May 1985, Reel/Disc 2 of 8;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NG Hak Liang(黄学良). 25 June 1985, Reel/Disc 7 of 16)。显然，战前已发展成型的边佳兰乡村农渔牧业，加上因为地处偏远而尚未因人为开发彻底枯竭的内陆森林资源，与此同时，特殊的因缘际会，又令边佳兰人意外获得额外的白米供应管道，舒缓了日据时期当地的粮食危机。

III . 产业发展与公共建设

除了农业、渔业、畜牧业三者结合的乡村经济模式，战争爆发前边佳兰规模最大的经济活动，自然非日本三五公司(Sango Koshi Consolidated Ltd)的边佳兰橡胶园莫属。1906年，三五公司以叻币20万元购得边佳兰山(Bukit Pengerang)周边2000英亩的土地，开创三五公司边佳兰橡胶园(Sango Koshi Pengerang Estate)(拓務省拓務局.1935,57)。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夕，三五公司边佳兰种植园区的橡胶可收割面积达6千英亩(株式会社华南银行.1930,14)。1933年，三五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由日本三菱财阀的关系企业、实际上为财阀创办人岩崎家族私人持股控制的东山农事株式会社出资入股(柴田善雅.2005,270-272)。日军占领边佳兰后，原先属于日资所有的边佳兰橡胶园也顺理成章，纳入新成立的“昭南护膜组合”(Synonan Gomu Kumiai)管辖下。史料显示，日据时期的边佳兰橡胶园似乎确有恢复生产。1943年，昭南护膜组合便计划沿着边佳兰山东面兴建一条总长1192英尺的轻轨，以便将橡胶从边佳兰橡胶园运至位于边佳兰山北侧的日军码头(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60/03)。但由于日本本土的橡胶需求有限，再加上1943年以后受到反法西斯盟军的海路封锁影响，导致橡胶难以运出马来亚及新加坡，

使得实际上日据时期的马来亚橡胶生产量骤减至战争爆发前夕的4分之1水平，而1942年至1944年的平均出口量更剧减至不足战争爆发前夕10分之1的惨况(Kratoska.1998,227)。

为了消化本地橡胶产量，日本人大力推动橡胶的本土消费，从而出现了将橡胶拿来做实心轮胎(The Syonan Shimbun.1943.9.7,2)，以及提炼橡胶油作为汽油替代品等实验(The Syonan Shimbun.1943.12.15,2)。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尝试所能消耗的橡胶产量依然少得可怜(Kratoska.1998,227)。橡胶贸易的剧烈萎缩，对日据时期边佳兰的橡胶种植小园主而言形同末日。首先在避难疏散期间，许多像刘振标这样的小园主的胶片库存被洗劫一空，血本无归；到了日据时期，更由于没有橡胶买主，导致小园主的橡胶生产可说是完全停顿(朱亮亮.2010,105)。

对于边佳兰产业结构而言，真正重大的改变，来自日据时期对五湾铝土矿的开采。铝土(Bauxite)是提炼金属铝的原材料，早在1930年，日本人便开始在包括边佳兰在内的柔佛东海岸地区进行勘探，并向柔佛政府申请开采准证，但始终未获批准(Geneal Adviser File No. 696/30)。1937年，日资公司石原产业株式会在边佳兰勘探到铝土矿藏，并向柔佛政府申请开采，却依旧被拒绝(丹野勲.2014,57)。1939年，或是由于二战爆发，铝矿作为飞机生产重要战略物资的缘故，身为英属马来亚一员的柔佛政府，一口气将全边佳兰地区的勘测与开采权授予了加拿大的铝业公司(Warden of Mines File No. 278/39; Mines of Johore File No. 279/39)。直到1942年日軍占領边佳兰后，五湾矿山終於落到了石原産業株式會社手上，並將之改名作“南岸ボーキサイト鋁山”(南岸鋁土矿山)，進行開采作业(丹野勲.2014,57)。

当时在五湾矿山里的劳动力，有来自柔佛古来的华人，也有来自爪哇岛和柔佛峇株吧辖的爪哇人，至于边佳兰本地华人则似乎不多见(Hj. Roslan Hj. Sulaiman.2001,64; 叶香.2019,15;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CHIA Chore Seng(谢佐先). 24 May 1985, Reel/Disc 2 of 8)。
 矿山在边佳兰有专属的农场与鱼栅(farms and fishing stakes), 并以此作为招聘宣传(The Syonan Shimbun.1944.8.23,2; 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78/03)。这些劳工当中, 也有从新加坡招聘过来的技术工人, 关均便是其中一员。关均是战前新加坡的三行工人, 日据时期他大概40岁出头, 被日本人招募到五湾矿山工作, 直到1945年4月为止才回到新加坡, 历时将近两年。日本人事前通过通译告诉他们目的地、工作天数和预支薪水, 收拾好行装后, 这些工人从红灯码头集体搭上大轮船出发, 历时大约6小时才抵达边加兰。在矿场里, 关均是同批招工的工头, 负责建造矿场里的“火炉”。按关均的说法, 五湾矿山里有工人宿舍, 伙食充足, 包吃包住, 但是医疗条件不好, 缺乏药品和医生, 蚊子又多, 饮水方面只有“山坑水”, 没有自来水。当时与他同一批前往边加兰的百多名工人当中, 到年杪时有二、三十人受“山风”病倒, 烂手烂脚而死。如果有工人死了, 其他工人就捡木头钉成棺材, 遗体入殓后, 几个工人停工, 将棺木埋葬。据他回忆, 矿山里有几十名日本军装人员进驻, 工人们并没有被拘禁, 却也没有工人逃走, 日本人也不会随便打人。入夜后, 工人们还会在一起聚赌取乐(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KWANG Koon (关均). 23 September 1982, Reel/Disc 5 of 8)。

值得一提的是, 与关均的亲身经历相比, 战时出生于四湾岛的叶香, 对于五湾矿工的描述却悲惨得多:

“这些劳工都得不到足够的粮食配给, 极度缺乏营养, 体弱多病, 病了没有得到医药治疗, 任其自生自灭, 因此病死的不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堆着尸体的双轮木板推车, 推去村边野地草草掩埋。这是我妈妈最惊惧的日子, 当她还从四湾岛挑着鸡粪到五湾岛的木薯芭时, 心里就默祷: 今天别再遇上死人。为了疗饥, 爪哇劳工常常在野地里找蜗牛、嫩

叶等野生动植物，宰之煮之食之。夜间三几个结队到村民的木薯芭、菜园偷拔木薯和蔬果以充饥。当时，木薯等农作物，正是村民的命根子，为了让家人活命，绝不能让自己的珍宝有任何闪失。所以村民们就组织起来，分组巡守……偶有爪哇劳工拿件上衣到村民家，要求换些木薯以充饥……”

(叶香.2019,15-16)

无论如何，日据期间的五湾矿山总共开采了4万5千4百50吨铝土矿。或许是为了将这些矿石从现成的边佳兰码头出口，日本人召集了边佳兰沿海地区各村落的老百姓来铺设一条衔接五湾矿山到边佳兰码头、“阔三十余英尺，长十余英里”的公路(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1945.12.29,3)。村民们参与的劳役，包括在头湾的后山炸石和碎石，以及整平道路等，村民们大部分时候都获偿付工资以及糖、米等日常必需品(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赖涌涛@流军). 1 July 2008, Reel/Disc 1 of 15)。这条公路有可能也附设了供轨道车行驶的铁轨(王新民.c.2004,23-24)³)。讽刺的是，由于日本的海路交通在战争后期遭受盟军不断攻击阻截，最终能成功出口到日本的边佳兰铝土矿，只有仅仅3450吨(Kratoska.1998,243)。继1920年代日本三五公司在边佳兰搭设轻轨以来，这条由日军督建的公路，成为史上第一条在真正意义上连通从丹戎头到五湾岛的公共交通工程(Hj. Roslan Hj. Sulaiman.2001,64)，并一直沿用到战后(南洋商报.1953.1.19,7)。

作为日本人在柔佛的产业，战后的三五公司边佳兰橡胶园与南岸铝土矿山，皆被定性为敌产，由政府托管。1945年11月，马来亚英军管制区当局开始派员了解边佳兰橡胶园的近况(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enior Civil Affairs Officer Johore File No. 6124/45)。有迹象显示，1946年中

3) 当时日军可能还沿路架设了电话线，但战后便遭拆除(朱亮亮.2010,162)。

旬, 边佳兰橡胶园最迟于1946年中旬已在柔佛敌产托管局的监管下运作(Custodian of Enemy Property Johore Bahru File No. 287/46)。南岸矿山的情况则更特殊, 虽然属于敌产, 但由于加拿大铝业公司仍持有战前的产权, 且在战后仍对继续在边佳兰五湾开采铝土矿表达浓厚兴趣, 以致柔佛政府有意将该矿山的开采权保留给对方, 也因此让五湾矿山的生产持续停摆至1950年代初为止(Collector of Land Revenue Kota Tinggi File No.18/47)。

另一方面, 从战前延续到日据时期的小园坵与渔牧业, 依旧是战后边佳兰的地方产业重心, “椰干、鱼虾、树胶, 这三大土产, 是边佳兰的营养素, 牲畜之类, 输出的数量也颇可观”(南洋商报.1948.1.20,7)。战后初期粮价高企的新加坡, 无疑是边佳兰禽畜类商品与粮食作物的销路保障(南洋商报.1946.8.26,3)。就连战时一度在四湾兴起的米粮转运生意, 和平后竟然仍以白米走私中转站的形式, 在四湾五湾持续了好一段日子(南洋商报.1946.6.18,2)。

根据马来亚人口普查数据, 1947年边佳兰乡(Mukim Pengerang)的总人口达7178人, 其中华人占4365人, 略少于1931年的4602人; 然而, 包括四湾岛在内的东海岸乡(Mukim Pantai Timor)总人口, 却从1931年的1029人, 激增至1947年的3352人, 其中华人人口更是从1931年的279人, 倍增至2130人(Del Tufo.1949, Table 5)。伴随人口增长的是聚落的发展。1948年一篇刊载于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游记有以下描述:

“……日寇统制该地后, 居民多移居至四湾内地去种植, 因此在四湾的商业却日见繁盛, 而变成了各小镇的一个中心区……由边佳兰开往四湾上去, 一路上两边都是疏的椰园, 经过头湾, 二湾, 与三湾这三个地方, 都是几十间屋子组成的一个个的村落, 但车子到了四湾情形却似乎不相同了, 这里的小店铺虽然没有边佳兰来的整齐, 但店铺却要多

些……在街上或店铺所见到的男人，除了些穿唐装的朴素衣裳外，其他都是赤着膊，下身祇穿着短裤，但是其中却有许多事拥有百依葛胶园椰园的地主……”
(南洋商报.1948.1.20, 7)

显然，战时的内陆粮食种植、矿山开采、乃至白米走私活动等要素，或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同样历经战火洗礼的四湾岛，在战后初期成为边佳兰地区最受瞩目、人口飞速增长的繁荣村落。在不久的未来，随着边佳兰沿海公路的修复使用，以及五湾矿山的恢复开采，将进一步巩固四湾岛成为边佳兰华人社会与经济中心的结构条件。

IV . 小结

在马来亚与新加坡，三年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无疑是个苦难时代，老百姓蒙受了巨大的性命与财产损失，留下了悲壮的战时记忆，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魂牵梦萦。正因如此，关于日据时期对马新社会影响的讨论，容易受到先入为主的善恶价值观所牵引，得出趋同的结论。通过对日据时期马来亚治理情况的追述与分析，克拉托斯卡(Paul H. Kratoska)发现，许多亲历战争年代的人们，实际上对那段历史感到五味杂陈，没有人想要重新体验一遍被日军统治的滋味，但在部分人眼中，日据亦曾带来些许善果(Kratoska.1998,347-350)。

纵观日据时期华人在边佳兰地区的战时生活记忆，对于日军暴行的具体记录并不多见，尤其难觅屠杀行为的描述；相对而言，对于战时饥谨的记忆，在边佳兰地区华人社群里并不少见，然而若与当时同处边佳兰的马来人、爪哇人以及矿山劳工相比，本地华人的生活条件显然并

不差。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当地固有的农渔牧复合型产业在战时依旧持续经营,令边佳兰华人在应对日据时期马来亚普遍发展粮食短缺窘境时显得较为宽裕;又因战时粮食供应短缺的大环境,赋予了边佳兰的渔业与畜牧业特殊的意义,或许也使得作为粮食生产者的边佳兰华人得到普遍的人身保障。

另一方面,尽管橡胶种植与生产活动受到战争期间难以出口的影响而沉寂,但作为战时重要军事资源的铝土矿开采活动,却为日据时期的边佳兰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沿海乡村的农渔牧复合型产业的持续经营、五湾矿山的开采、衔接丹戎头到五湾岛的公路铺设、以及四湾岛在日据时期新加坡米粮转运上所扮演的角色,促成了日据时期边佳兰的经济发展重心东移,为战后边佳兰华人地域社会的形态调整奠定基础。

투고일: 2022.12.17. 심사완료일: 2023.01.10. 게재확정일: 2023.01.17

| 参考文献 |

1. 中文

- 赖益盛等(编). 2007, *柔佛华侨殉难义烈史全辑*, 新山: 新山托德书香楼。
- 吕少雄. 1999, *三年八个月*, 古来: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柔佛州联委会。
- 莫家浩. 2021, “从野境到边乡: 地方治理、产业变迁与近代边佳兰的诞生”, *南洋学报* 第75卷, pp. 79-95。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大战与南侨》编纂委员会(编). 2007, *大战与南侨 (重版缩印本)*, 吉隆坡: 隆雪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
- 潘浦仁.(1964年2月19日). “抚今思昔话边佳兰” *南洋商报*. p.13。
- 王新民.c.2004, “大湾岛简史”, 王新民(编). *大新学校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1945-2004*, 出版地不详, pp.22-25。
- 叶香. 2019, *边佳兰旧事*, 新山: Ooi Publisher。
- 佚名.(1945年12月29日). “光复后的边佳兰” *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 p.3。
- 佚名.(1941年3月20日). “来星只有一进口航政司经发出通告” *南洋商报*. p.31。
- 佚名.(1946年6月18日). “油碇四五湾岛米船三十余只突然遭扣留估计共载有白米二万余担以黑市价计算约值百万元” *南洋商报*. p.2。
- 佚名.(1946年8月26日). “各岛屿黑市米价较本坡便宜甚多” *南洋商报*. p.3。
- 佚名.(1953年1月19日). “边佳兰丹戎头迄五湾岛止将铺造柏油路并围铁线网当局已派员勘测” *南洋商报*. p.7。
- 张正.(1948年1月20日). “由边佳兰到七湾岛” *南洋商报*. p.7。
- 郑昭贤(编). 2018, *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 麻坡: 麻坡漳泉公会。
- 朱亮亮. 2010, *追虹*, 新加坡: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2. 英文

- Anon. (15 December 1943). “Consumption, Transfer, And Disposal Of Rubber-Oil To Be Controlled In Malai”, *The Syonan Shimbun*. p.2.

- Anon. (26 September 1942). "More Fresh Fish For Syonan Soon" *The Syonan Shimbun*. p.4.
- Anon. (5 May 1944). "Johore Fast Developing Into Vast Food Reservoir" *The Syonan Shimbun*. p.2.
- Anon. (7 September 1943). "Johore Malai Invents Solid Cycle Tyre", *The Syonan Shimbun*. p.2.
- Chin, Kee Onn. 1976, *Malaya upside down*, Kuala Lumpur: Federal Publications Sdn. Bhd..
- Del Tufo, M.V. 1949,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Malaya (Comprising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London: The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 H.A.J.I. (7 October 1932). "Diana Cov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p.1.
- Ishihara Sangyo Kabushiki Kaisha. (23 August 1944). "Wanted", *The Syonan Shimbun*. p.2.
- Kratoska, Paul H. 1998,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3. 日文

- 株式會社華南銀行. 1930, *馬來半島柔佛王国コタテンギ並ニ柔佛河沿岸邦人護謨園現況*, 東京: 華南銀行。
- 柴田善雅. 2005, *南洋日系栽培会社の時代*, 東京: 日本經濟評論社。
- 拓務省拓務局(編著). 1935, *南洋栽培事業要覽(昭和9年版)*, 東京: 拓務省拓務局。
- 丹野勲. 2014, *戦前日本企業の南方への投資: 石原産業を事例として*, 神奈川大学国際経営論集第25號, pp. 39-64.
- 林博史. 2007, *シンガポール華僑肅清: 日本軍はシンガポールで何をしたのか*, 東京: 高文研。

4. 马来文

- Hj. Sulaiman, Hj. Roslan. 2001, "Sejarah Daerah Kecil Pengerang", edited by Kassim

Thukiman, Yahaya Abu Bakar, and Mahmud Embong. *Menelusuri sejarah tempatan Johor*, Johor Bahru: Yayasan Warisan Johor.

Mayudin, Ghazali. 1978, *Johor semasa pendudukan Jepun, 1942-1945*, Bangi: Jabatan Sejarah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5. 口述资料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CHIA Chore Seng(谢佐先). 24 May 1985, [Accession No. 000565],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Jack NG Kim Boon. 22 November 1983, [Accession No. 000362],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KWANG Koon (关均). 23 September 1982, [Accession No. 000217],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赖涌涛@流军). 1 July 2008, [Accession No. 003332],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NG Hak Liang(黄学良). 25 June 1985, [Accession No. 000681],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6. 档案资料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enior Civil Affairs Officer Johore File No. 6124/45. “Departmental reports & correspondence enemy property”,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enior Civil Affairs Officer Johore File No. 6130/45. “Departmental reports & Correspondence Marine Fishery & Machinery”,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Collector of Land Revenue Kota Tinggi File No. 18/47. “Alienated lands mined for bauxit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in Pantai Timor”,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01/02. “Memohon balik bekerja menjadi Settlement Officer bagi Mukim Pengerang, Kota Tinggi”, Johor Bahru:

-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 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60-03. "Erection of trolley line from Pengerang Estate to jetty",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 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78/03. "Application for 1502.4 acres of state land for planting foodstuffs at Pengerang",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 Custodian of Enemy Property Johore Bahru File No. 287/46. "Claim by Malayan Pineapple Factory Co in respect of machinery lying in Pengerang",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 General Adviser File No. 696/30. "Application by a Japanese firm for mining rights in Johore. Requesting info re the alleged deposits of aluminium in Johore",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 Mines of Johore File No. 279/39. "Application for a Permit to prospect for Bauxite over all the available State Land to the east & south of the red boundary in the mukims of Pengerang, Pantai Timor & Tanjong Surat",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 Warden of Mines File No. 278/39. "Application for Prospecting(bauxite) Aluminium Laboratoris Limited at Sungei Pendas Estate, Mukim Pulai, Johor Bahru District",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변진불경(邊塵不驚):

일본 점령기 말라야(Malaya) 팽게랑(邊佳蘭, Pengerang)
지역 화인의 전시 생활 및 지역 발전*

박자호(莫家浩)**

-
- I. 머리말
 - II. 전시 생활 및 식량 문제
 - III. 산업발전 및 공공시설 건설
 - IV. 맺음말
-

■ 국문초록

말라야와 싱가포르에서 3년 8개월간의 일본 점령기는 고난의 시대라고 하면 누구도 의심할 여지가 없다. 백성들이 막대한 인명피해와 재산손실을 입었던 한편, 눈물겨운 전시 기억이 많이 남아 있고 이러한 기억이 현재까지도 계속 상기되고 있다. 이 글은 1941~1945년 태평양전쟁 시기 서로 다른

* 본고는 말레이시아 쉴빌란(森美蘭) 중화대회당(中華大會堂)이 주최한 말레이시아 화인 지방사 연구 국제 심포지엄(2022년 8월 20~21일)에 발표한 초고에 기반하여 재구성했음.

** 홍콩중문대 역사학 박사, 말레이시아 조호르주 조호르바루 화인에스니시티역사 박물관 관리위원.

e-mail: bakjiahow@gmail.com.

행위주체의 전시 경험과 기록물·문헌에 대한 분석을 통해 말라야 조호르주 핑게랑 지역의 화인들이 어떻게 삶을 영위했었는지를 살펴보고, 일본 점령 하의 현지 산업경제 발전 상황을 정리함으로써 전쟁이 핑게랑 화교사회와 산업 발전에 미치는 영향을 재조명하고자 한다. 이 글은 핑게랑의 독특한 지리적 여건과 산업발전 형태 덕분에 현지 화인들이 대규모 학살과 굶주림을 면하게 됐다고 본다. 일본 군정 당국이 현지에서 진행했던 인프라 건설과 광산업 개발 역시 현지 산업 발전 모델을 간접적으로 재구성했다. 이러한 일본 점령기에 재설정된 발전 모델은 또한 전후 초기 핑게랑의 경제·사회적 구조의 토대가 되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주제어: 일본 점령기, 말라야, 핑게랑, 화인, 전시, 생활, 지역, 발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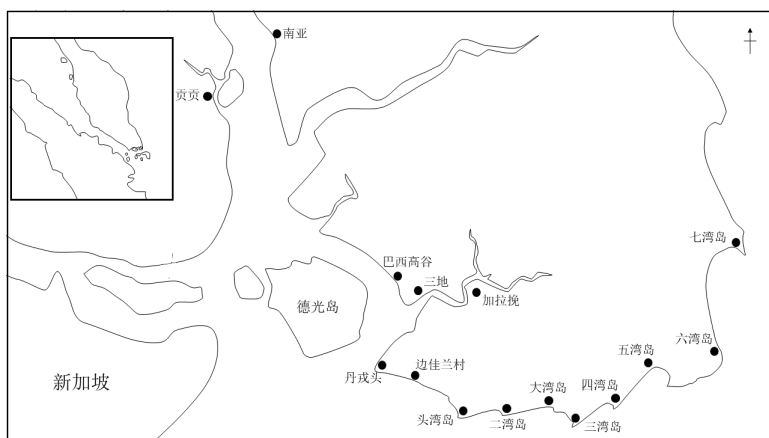
I. 머리말

1941~1945년 간의 태평양전쟁은 인류 역사의 뼈아픈 경험이었다. 말레이반도 조호르(柔佛, Johor) 지역 일대에서 일본 점령기의 고난에 관련된 기억은 오늘날까지 축적됐으며, 확고한 자료 기반이 이미 형성되었다고 할 수 있다(呂少雄, 1999, 賴益盛, 2007, 林博史, 2007,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大戰與南僑》編撰委員會 編, 2007, 蕭依釗, 2014, 鄭昭賢, 2018). 사실 대전이 끝난 직후인 1945년 12월 29일 싱가포르에서 발행된 『星州日報總匯報聯合版』에서 한 익명자가 쓴 「光復後的邊佳蘭」이라는 글이 게재되었다. 일본 점령기에 대한 비판적인 입장에도 불구하고 이 글에서 일본 점령기의 광산 채굴, 농장 개척, 호구조사, 유상노동, 도로부설 등의 근대적 통치 행위 다음과 같이 언급한 바가 있다는 점 역시 주목해야 한다.

“이시하리산업주식회사(石原産業株式會社)”는 일본 신진 재벌 중의 하나로서, 자국 남양 침략의 승리를 이용하여 일본 재벌계에서 자신의 위상을 제고하고자 하며, 남양 진출을 통해 “미쓰비시(三菱)”, “미쓰이(三井)”와 같은 기성 재벌들과 경쟁하려고 했다. 따라서 이 회사는 “이시하리산업남안광산주식회사(石原産業南岸礦山株式會社)”라는 간판을 걸고 팽계랑 지역에서 각종 사업을 대대적으로 추진했다. 이들 사업 가운데 주목해야 할 부분은 곧 광산 채굴 및 농장 개척이었다. 이들 사업의 추진 과정에서 인민을 지배하는 각종 수단이 동원되었다. 호적 조사도 하고 현지인에게 노역을 강제하기도 했다. 노역시킬 때 1인당 하루에 쌀 4냥(兩), 초폐(蕉幣, banana money, 즉 동남에 일본군 점령지역에서 발행된 일본군용수표의 별칭) 몇 푼만 배급해주고 노동을 강요했다. 이렇게 식량도 부족한 채 하루종일 노역을 해야 하는데 피곤할 수밖에 없었다. 그런데 잠깐 정신 못 차리면 바로 채찍질을 당했다. 어린이조차 강제노동에 면할 수 없고, 그렇지 못하는 사람은 나쁜

사람으로 분류되었다. 뿐만 아니라, 일본인은 교통 및 광석 운송의 편리를 위해 도로를 부설했다. 팽게랑의 丹絨 (Tanjung Pengelih) 및 頭灣(Kampung Jawa)로부터 二灣(Teluk Empang), 三灣(Sungai Buntu), 四灣, 六灣을 거쳐 넓이 30여 피트의 도로를 약 10여 마일 정도 부설했다. 또한 加拉挽(Pelawan), 四灣, 三地(Santi), 그리고 巴西(Pasir Gogok) 일대 약 5000~6000 에이커의 황무지를 개척하기도 했다. 하지만 이 구불구불한 도로와 광대한 농장 때문에 많은 인민이 피와 땀을 흘려 수천 명의 희생자까지 초래했다.

팽게랑은 말레이시아 조호르주에 관할을 받고, 말레이반도의 남동쪽 끝 자리에 위치하고, 싱가포르와 바다 사이를 두고 서로 마주본다. 19세기부터 화인 이민들이 팽게랑 30km의 해안선과 내륙 산림을 개척하여 정착하기 시작했다. 육상 교통이 편리하지 않아 주로 수로에 의존하여 외부와 교류해 왔다(莫家浩 2021). 「光復後的邊佳蘭」에 따르면 전시 팽게랑에서는 잔혹한 식민통치만 벌어졌던 곳이 아니라 공공시설 건설과 산업개발의 요소도 겸비했다고 할 수 있다. 이 글은 팽게랑의 각종 전시 기억 및 문헌



〈그림1〉 팽게랑 지역 및 주변 주요 취락의 약도

출처: 구글 지도 및 필자의 현지 조사에 의해 작성됨

기록에 대한 정리를 통해, 한편으로는 기존 주류적인 역사 서사(敍事)와 비교하면서,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전시 경험이 전후 산업개발에 미치는 영향을 검토함으로써 전쟁이 팽게랑 지역 발전 모델에 미치는 영향을 재조명하고자 한다.

II. 전시 생활 및 식량문제

1942년 2월 15일 싱가포르에 주둔했던 영국군이 일본군에게 항복한 것은 태평양전쟁 일환으로서의 말라야 작전이 일본군의 승리로 끝난 것을 상징했다. 그러나 2월 하순에 이르러서야 일본군이 비로소 팽게랑에 진주하여 3년 반의 일본 군사점령을 시작했다¹⁾. 그러나 일본군의 팽게랑 진주는 곧 팽게랑이 군사 통치에 들어간다는 의미가 아니었다는 점을 유의해야 한다. 왜냐하면, 당시 일본 점령군 당국은 말레이반도의 캐다(吉打, Kedah), 페라크(霹靂, Perak), 셀랑고르(雪蘭莪, Selangor), 쎄빌란(森美蘭, Sembilan), 파항(彭亨, Pahang), 켈란탄(吉蘭丹, Kelantan), 테렝가누(丁加奴, Terengganu), 므라카(馬六甲, Melaka), 조호르, 피낭(彼南 혹은 檳城, Pinang) 등의 10개 주와 쇼난특별시(昭南特別市, Syonan, 즉 현재 싱가포르)를 말레이군정감부(馬來軍政監部)의 관할 범위로 편입시켰지만, 조호르주 기존의 정부 행정구조를 크게 바꾸지 않았고, 특히 지방 행정 차원에서 여전히 영국 식민시기의 구조를 그대로 유지했다(Ghazali bin Mayudin, 1978, 20-25). 따라서 지방 행정 차원에 있어, 일본 점령기의 팽게랑은 여전

1) 현지 화인의 다른 한 가지 이야기에 따르면, 당시 팽게랑에 주둔했던 일본군의 규모는 10명~20명 정도 불과했다고 한다.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賴湧濤@流軍), 1 July 2008,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332, Reel/Disc 1 of 15 참조.

히 코타팅기(哥打丁宜, Kota Tinggi)현의 지도를 받았다.²⁾

총체적으로 보면, 일본 점령기 팽계랑에서는 숙청·학살이나 삼광정책(三光政策)과 같은 일본군의 폭행이 있었다는 확고한 증거는 아직 발견되지 못했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백성에게 민폐를 끼치는 일본군 병사의 행위는 매우 흔하였다. 이들 가운데 가장 대표적인 것은 서민을 상대로 가축을 강제로 얻어 내는 것이었다³⁾. 예컨대 팽계랑 화인 부자 劉振標의 자녀가 당시의 상황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은 기억이 있었다(周亮亮, 2010, 100-101).

일본군이 왔을 때는 많으면 8~9명, 적으면 1~2명씩이었다. …… 이럴 때 집안의 젊은 여성과 남성들은 얼른 일손을 놓고 본채 뒤편 좁은 사랑으로 달려갔다. 그곳에서는 이동할 수 있는 널빤지 몇 개가 있었고, 그 널빤지를 옮기면 집 바깥쪽에 한 사람 키만큼 자라는 풀숲으로 몸을 숨겨 도망할 수 있었다. …… 일본군이 들어오면 양민의 모습을 보여 계속 허리를 굽혀 고개를 끄덕이는 외할아버지, 파란 옷과 검은 바지를 입고 머리 뒤에 상투를 묶는 할머니 두 명, 그리고 아직 어린 나이에 불과한 아동 몇 명만 보일 수 있었다. 일본어를 조금 할 줄 아는 머슴 阿順이 이제 나와서 일본인을 공손하게 모시고 여기저기 구경시켰다. 일본놈들은 항상 소리를 지르고 손짓을 하면서 닭과 오리를 내라고 요구했다. 그럴 때 阿順은 닭과 오리를 잡아주고, 달걀을 내라고 하면 팔려는 달걀을 한 바구니에 가득 담아 양손으로 쥐었다.

젊은 여성이 있는 劉振標 집안에게 일본인 병사들은 또한 다른 한 가지의 위협이 될 수 있었다. 당시 27세였던 劉振標의 장녀인 劉麗卿은 이미

2)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檔案編號CLM201/02 참조.

3) 일본 점령기 당시 3, 4세 나이에 불과한 賴湧濤는 지금도 일본군 병사들이 삼림 가장자리 지대에 경작하는 그의 집으로 와서 닭과 오리를 내라고 하는 흉악한 모습을 기억하고 있다.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賴湧濤@流军), 1 July 2008,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332, Reel/Disc 2 of 15 참조.

4명의 아이를 낳았던 유부녀에도 불구하고 “꽃 처녀(花姑娘)”를 찾아오는 일본인이 마을에 들어갔다는 소식을 듣자마자 태어난 지 얼마 안 되는 막내아들을 품에 숨기고 이불을 덮고 침대에 누워 피병을 부렸다. 그녀가 당시 살고 있던 집의 주인은 젊고 예쁜 여성이었는데, 이 여성 역시 소식을 듣고 바로 부엌 바깥에 빗물을 담고 있는 큰 항아리 안에 들어가서 피신했다. 일본군 병사들이 떠난 이후 다시 보니, 劉麗卿의 막내아들이 얼굴이 검게 바뀌고 숨이 끊어질 뻔했고 여자 집주인 역시 빗물이 가득 찬 항아리에서 죽을 뻔했다. 劉麗卿의 여동생 劉麗嫻은 당시 결혼도 아직 안 하던 젊은 여성이면서, 핑계랑 지역에서 싱가포르에서 중학교에 다녔던 유일한 여자였지만, 그녀 역시 평소 집에서 지저분한 남자아이의 옷차림으로 진실한 신분을 은폐했다. 한번 일본인이 핑계랑에서 학교에 다녔던 젊은 여자를 잡을 것이라는 소식을 듣고 불길한 생각이 들어서 밤새 거룻배를 타고 싱가포르로 도망갔다(朱亮亮 2010, 101-104).

일본의 군사점령기에도 불구하고 전쟁 발발 이전 벵게랑 연해 지역에서 이미 번영했던 농촌경제의 성장세는 끊어지지 않았다. 핑계랑 연해 지역의 화인 촌락에서 20세기 초반부터 경제작물 재배와 가금·가축 사육을 병행하고 서로 보완하는 복합영농식의 농촌경제 모델을 개발했다. 1964년 『南洋商報』라는 신문은 「핑계랑 오늘날의 모습과 옛날 이야기들(撫今思昔話邊佳蘭)」이라는 기사를 게재했는데, 이 기사의 기자가 핑계랑에 거주했던 한 백세노인에게 인터뷰를 했다고 주장했다. 이 기사에서 백세노인에 대한 인터뷰를 통해 핑계랑의 백년사를 다음과 같이 회고했다(南洋商報. 1964.02.19., 13).

인류가 이곳에 처음 정착한 이후, 어업과 수렵이라는 원시적인 생계수단을 유지했다. 나중에 사람들은 이 지역의 바다에서 해산물이 많이 나온다는 것을 알게 되자, 자신의 친족과 지인에게 이 소식을 전하고 이곳으로 와서

살아가는 법을 찾으라고 했다. 당시 이들은 땀을 흘리면서 대자연 속에서 동식물과 경쟁했고, 기세등등한 짐승들을 순량하게 길들였고, 결국 점점 이 지역에서 인간의 영역을 확보하고 인구도 날로 많아졌다. 일부 똑똑한 사람들은 어업과 수렵이라는 단순한 생업에 의존하면 인구의 증가에 수반한 각종 수요를 만족시키지 못했다는 생각이 들어서 토지에 대한 활용을 시작했다. 처음에는 야자나무, 과실나무, 그리고 고무나무를 심었다. 이는 곧 현재 이 현(縣)의 코코넛 농장과 고무나무 농장의 시작점이었다. 그때 이 지역에서 “왕이 없는 땅”이라고 할 수 있어서 어느 위치가 마음에 들면 바로 개간할 수 있었다. 이렇게 자유로운 토지 개간이 오랫동안 지속되었다. 나중에 정부의 토지법령이 전국 각 지역에서 발효했지만, 사람들은 나무를 먼저 심고 나중에 토지세를 신고한다는 기존의 관행을 여전히 유지했다. 사실 토지법령에 근거하면 이러한 행위는 정부의 토지를 불법으로 점유하고 사용하는 행위로 인정되어서 정부는 관련자를 법원에 고소할 충분한 권력을 가지고 있었다. 하지만 당시 정부의 대응은 토지세 신고만 격려하는 정책에만 그쳤다. 따라서 七灣島(Punggai)와 같은 오지조차 현지인의 조상에 의해 코코넛 농장으로 개간되어 버렸다. 또한, 농지 개간 혹은 임야 조성과 동시에 가금과 가축의 사육도 병행하는 화인의 관습이 있었다. 왜냐하면 가금과 가축의 분변이 작물의 비료로 활용될 수 있기 때문이었다. 그리하여 2차 대전 이후 긴급 법령 실행 전까지 해당 현이 관내 지역에서 육상의 농업생산과 해상의 어업이 병행하면서 빠르게 발전하는 모습이 보였다 …….

이 기자의 글은, 익명의 백세노인이 후손에게 준 과거 이야기라는 형식을 통해 쟁계랑 현지 화인의 시각으로 전개된 지역 개발사를 서술한다. 어업과 수렵, 그리고 고무나무 재배를 제외하고, 더 주목받아야 할 것은, 화인들이 땅을 먼저 점유하고 나중에 세금을 신고하는 불법 방식을 통해, 가장 황폐한 오지에서 코코넛 농장을 개간하고, 가금·가축의 사육 및 가금·가축 분변의 비료로 활용까지 일련의 육지 농업생산 체제를 만들었다는 점이었다. 즉 당시 화인들의 노력으로 육지 농업생산과 연해

어업생산이 병행하는 산업 발전 모델이 수립되었다는 점이였다. 이러한 산업 발전 모델의 수립은 적어도 2차대전 직전까지 완성되었고, 당시 발전 모델이 수립된 핑게랑 연해 지역의 모습은 1932년 유럽인의 여행기에서 다음과 같이 포착되었다(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32.10.7., 1).

해변의 넓은 백사장을 에워싼 야자나무 숲에서 말레이인과 화인 아택식(亞答式, atap, 지붕과 외벽이 야자나무의 잎으로 지어진 동남아시아 전통 주택의 형식) 주택의 지붕이 은은하게 깔려 있다. 바다의 얇은 곳 주변에서 적지 않은 수량의 배들이 정박하고 있고, 그물 등과 같은 어구가 바다에 널리 퍼져지고 있다. 이들 어구는 어두운 야간이나 만조가 될 때 꼭대기만 물 위에 살짝 노출해서 왕래하는 선박의 통행에 불편을 초래한다 …… 탄중 아얌(雞岬, Tanjong Ayam)이라는 낮은 절벽에서 三灣의 경비초소가 서 있다 …… 절벽 뒤편의 땅은 화인들이 점유하고 있고, 이들 화인은 버린 어획을 가금의 사료로 활용하고, 이렇게 키운 수백 마리의 오리를 싱가포르의 시장으로 내 보낸다 …… 여기 바다의 얇은 곳에서 초석이 없어서 배를 편리하게 정박할 수 있다. 그래서 절벽의 안쪽에 화인 어민들이 간이주소로 삼는 몇몇 농막을 보일 수 있다. 절벽 꼭대기에 야자나무 묘목들이 자라고 있는데, 이들 야자나무 묘목들이 오른쪽으로 퍼져 절벽 이미 장성한 작은 야자나무 숲과 연결된다. ……

예컨대 劉振標의 경우, 그는 頭灣, 二灣, 大灣에서 4개의 피싱스테이크(fishing Stake, 바닷물에서 나무 말뚝을 세워 말뚝 가운데 그물을 설치하여 물고기를 잡는 장치)을 소유하고 있었다. 이들 시설은 일본 점령기에도 여전히 정상 운영되어 어획량도 감소하지 않았다. 심지어 劉振標는 닭, 오리, 돼지를 키우는 고용인 4명과 배를 조종하는 고용인 2명을 더 고용했다. 배를 조종하는 고용인은 포획된 해산물을 싱가포르에 운반하여 파는 일을 담당했다. 이러한 일의 총책임자는 劉振標의 장남인 劉熙成이며, 劉熙成

은 매일 뱅거랑 피싱스테이크에서 얻던 어획을 싱가포르 엘긴 브릿지(吊桥头, Elgin Bridge)의 신파사르(新巴刹, New Pasar, Pasar은 시장의 뜻)까지 운반하여 판매하곤 했다(朱亮亮. 2010, 105, 109).

그리하여 민생에 대한 일본군의 교란 행위에도 불구하고 劉씨 일가에 있어 일본 점령기의 뱅거랑에서는 기근과 빈곤과 관련된 기억이 거의 없고, 오히려 다음과 같은 모습을 보였다(朱亮亮. 2010, 104, 106).

일본인이 언젠간 올까 봐 걱정한 것을 제외하고서는 일본 점령기 뱅거랑의 백성들이 대다수 굶은 적이 없었다. 대다수 사람들은 스스로 고구마, 카사바, 야채를 재배했다. 해산물도 매우 풍부하고 어획이 끊어진 적이 없었다. …… 그때 二灣의 고택에서 매일 모여서 밥을 먹는 식구들은 40여 명이었다. 그래서 부엌에서 가장 큰 솥과 가장 큰 아궁이를 사용했다. 점령기 후반 뱅거랑 二灣의 고택에서 밥 짓는 연기가 모락모락 피어오르는 장면이 늘 보여서 온갖 평온과 안정의 모습만 드러냈다.

거시적 역사 배경 보면, 뱅거랑 연해 고유의 어업과 축산업은, 일본 점령기에 매우 높은 가치가 가지고 있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1942년 하반기부터 싱가포르의 신선한 해산물 공급이 차질이 생겨 인근의 리아우 제도(廖內群島, Riau Islands)나 조호르에서 해산물을 수입해야만 공급 공백을 채울 수 있었다(The Syonan Shimbun. 1942.9.26. 4). 1944년에 이르러, 조호르는 이미 싱가포르의 가장 중요한 식량 공급지로 자리를 잡았다. 당시의 신문을 보면, 코프라(椰乾)를 가공하는 과정에서 남는 코코넛의 잔류물은 가성비가 좋은 가축 사료로 간주하며, 야자나무 숲은 가축을 사육하는 가장 이상적인 장소로 여겨졌다는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었다. 그리고 신선한 과일, 고구마, 그리고 어획은 매일 조호르로부터 싱가포르로 공급되었다고 보도되었다(The Syonan Shimbun. 1944.5.5., 2).

다른 한편으로, 일본 점령기 일본 측은 조호르주 각 현에서 어업조합 (Fish Association)을 설립했다. 어업조합의 조합원은 각 지역에서 어업 중 개인 허가(Fish brokers license)를 발급받고 피싱스테이크를 보유하는 화인이었고, 조합장은 일본인이 담당했다. 어업조합의 역할은 피싱스테이크에 포획된 어획과 기타 어업 활동에서 얻는 어획을 저가로 수매하여 다시 저가로 시장에 유통시키는 것이었다. 하지만 실제 상황 수매된 고품질 어획은 일본인, 병원, 그리고 일본군에게 우선 공급하고, 나머지 품질이 좋지 않은 작은 생선은 시장에서 비싸게 판매되었다⁴⁾. 이러한 조치 때문에 피싱스테이크 설치 및 기타 어획 활동이 일본 점령기에도 지속할 수 있게 된 한편, 실질적인 공급 부족을 유발하여 생선 가격의 인상을 초래하였다. 결국 원래 사료 혹은 비료만으로 활용된 품질이 안 좋은 작은 생선들도 수익성이 생겨났다.

사실상, 3년 8개월의 일본 점령기 동안, 말라야의 전반적인 농식품 가격, 특히 흰쌀, 돼지고기, 달걀, 생선류 등 품목의 가격은, 매년 3~5배의 큰 폭으로 급등했다(Chin, 1976, 38-45). 그러나 전쟁 전부터 상술한 식량 생산을 종사해 왔던 팽게랑 연해 지역에 대해, 일반 마을사람들이 자급자족이란 능력을 통해 전시 생활의 어려움을 극복할 수 있었다. 다음과 같은 마을사람의 기억을 보면, 물론 이들은 劉씨 일가만큼 부유하지 못해도 배고픔을 면할 수 있었다는 점을 확인할 수 있다(葉香, 2019, 14-15).

시장에서 파는 생필품이 부족하고 물가가 폭등했다. 대부분 마을사람들은 식량을 구매할 수 없거나 구매할 돈이 부족했다. 그러나 이들은 카사바, 고구마, 고구마 잎을 주식으로 삼아, 쌀 한 자루와 같이 큰 솥에 넣고 죽을 끓여 식사를 해결했다. 이때 흰색의 쌀알은 오히려 카사바와 고구마의 장식물이

4)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档案编号BMA SCAOJ6130 참조.

되어버렸다. …… 자가 텃밭에서 나온 비름나물, 시금치, 부추 등을 반찬으로 삼으면 식구들을 먹고살 수 있게 했다. 어민 가구의 경우, 카사바·고구마 등에 작은 생선과 새우로 맞추어서 농가의 식탁보다 맛이 훨씬 신선하고 입에 더 맛있다. …… 많은 가난한 마을 사람들은 부증이 생겨 얼굴과 하지 피부가 붓고 노랗게 되었는데, 이는 카사바·고구마, 그리고 야생 나물로 배를 채우고 단백질 섭취가 부족한 탓이었다. 특히 당시 임신부들도 카사바·고구마를 주식으로 삼아 고기와 달걀에서 나온 단백질 섭취가 부족해서 영양실조가 되어 출산 후 기혈부족, 부증, 그리고 얼굴이 초췌해지는 현상이 흔히 나타났다. 산부 기혈의 빠른 회복을 위해 마을사람들이 가슴 아픔을 참아 집에 오래 키운 개를 죽이기도 했다.

전쟁 전 고무나무를 재배하고 고무를 얻어 생계를 유지했던 일부 마을 사람도 생계방식을 식량작물 재배와 가금·가축 사육으로 전환했다. 頭灣의 爪亞壩에서 거주하던 賴湧濤 일가는 원래 고무나무를 재배하여 생활했다. 일본 점령기 不蘭打라는 뱅거랑의 내육지역에서 賴湧濤의 부친이 친구들과 함께 삼림 가장자리에서 화전 논을 만들어, 논에 물을 끌어대어 벼농사를 지었다. 벼농사가 성공한 이후 賴湧濤 온 가족과 이웃 세 농가가 이곳으로 이주하여 정착했다. 이곳은 나중에 “新芭”라는 마을이 되었다. 벼농사 이외에는 이들이 돼지와 닭 등 가금·가축도 사육했다. 삼림의 가장자리라서 독사와 맹수에게 물리는 위험이 있었지만, 멧돼지, 흰코사향고양이, 다람쥐, 참새 등과 같은 야생동물을 잡아서 식탁 위에 육류의 부족을 채울 수 있다는 좋은 측면도 있었다⁵⁾.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전시 싱가포르 흰쌀 공급 차질의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1943년부터 일본군이 싱가포르 화인 선주(船主)에게 태국으로부터 흰

5)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賴湧濤@流軍), 1 July 2008,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332, Reel/Disc 1 of 15 참조.

쌀을 수입하는 것을 허용해 주었다. 연료 부족과 팽계랑-싱가포르 간의 항로에서 영국이 부설한 수뢰를 아직 제거되지 못한 탓으로 대부분 선주가 목제돛단배를 이용하여 태국산 흰쌀을 운반했다. 화인 선주들은 물물교환의 형식으로 태국인으로부터 흰쌀 등 여타 식량을 얻어 싱가포르에 돌아가면 일본인에게 상납했다⁶⁾. 식량 운송의 필수 경유지로서, 전시의 팽계랑 四灣은 식량의 중계 운송거점이 되었다. 따라서 현지인들이 식량을 얻을 기회가 훨씬 더 높아졌다(朱亮亮. 2010, 104-105).

이때 머리가 똑똑한 일본 상인들이 팽계랑의 현지인과 협업해서 “낭(浪)”이라는 회사를 설립했다. 이 회사는 싱가포르의 선주들을 조직하고 말라야 동해안에 따라 시암만(Gulf of Siam)으로 북상하여 쌀을 사들이었다. 싱가포르로 회항할 때 백여 척의 배들이 호호탕탕하게 四灣에 진입하여 닻을 내려 바람을 피하면서 휴식을 취했다. 휴식하는 동안 선주들이 기선이나 모터보트로 쌀가마니를 많이 싣고 싱가포르로 밀수입하는 겁이 없는 사람들을 기다리기도 했다. 당시 싱가포르 주변의 해면에서 많은 수뢰가 부설되어 상선들이 접근조차 하지 못했다. …… 하지만 밀지는 장사를 할 사람이 없지만, 참수형을 처할 수 있는 장사가 오히려 할 사람이 많다는 말처럼, 싱가포르로 쌀을 밀수입하는 것을 승낙한 사람들은 대체로 자신의 목숨도 아끼지 않고 쌀에만 관심이 있었다. 이들은 선주로부터 다섯, 열 가마니를 받으면 바로 四灣의 시장에 메어가서 몰래 팔았다.

결국, 전시 팽계랑 사람들은 채소, 과일, 어획, 축산 등의 분야에서 자급자족을 실현했을 뿐 아니라, 물자가 가장 결핍했던 전쟁 후반에는 오히려 흰쌀의 공급도 무난해졌다. “말레이인을 포함한 팽계랑 일대의 주민들은 전쟁 시기에도 흰쌀을 먹을 수 있었다. 집집마다 가금·가축을 키울 뿐만

6)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Jack NG Kim Boon, 22 November 1983,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362, Reel/Disc 4 of 10.

아니라 식량 비축도 할 줄 알았다. 이들은 혹시 영국과 일본의 전쟁이 다시 벌어질까 봐 걱정해서 집에서 적어도 보름 정도에서 한달치 식량 여분을 비축하고 있었다(朱亮亮, 2010, 105).”⁷⁾ 그러므로, 전쟁 전 이미 개발된 농업·임업·어업·축산업 복합형 농업경제 모델, 교통의 불편으로 인해 아직 개발로 인해 고갈되지 않았던 내육 삼림 자원, 그리고 특수한 관계 때문에 의외로 타개된 흰쌀 공급 통로 등의 다양한 요소와 함께, 일본 점령기의 식량위기를 완화하는 효과를 창출했다는 사실은 분명하다.

III. 산업발전과 공공시설 건설

농업·어업·축산업이 서로 결합된 복합형 농촌경제 모델 이외, 전쟁 발발 이전 핑게랑에서 규모가 가장 큰 경제활동은 일본 산고코시회사(三五公司, Sango Koshi Consolidated Ltd)가 경영하던 고무나무 농장을 뽑힐 수 밖에 없었다. 1906년 이 회사가 20만 해협 달러(叻幣, Straits Dollar, 즉 영국령 말라야, 싱가포르 등 동남아 지역에서 영국식민 당국이 발행했던 화폐임)의 가격으로 핑게랑산(邊佳蘭山, Bukit Pengerang) 주변 토지 2000에이커를 매입하여 산고코시핑게랑고무농장(三五公司邊佳蘭橡膠園, Sango Koshi Pengerang Estate)을 설립했다(拓務省拓務局 1935, 57). 1929년 세계 경제 대침체 발발 직전, 산고코시핑게랑고무농장의 수확 가능한 면적은 이미 6000에이커에 달했다(株式會社華南銀行 1930, 14). 1933년 산고코시

7) 일본 점령기를 경험했던 다른 제보자의 구술사에서도 이 현상을 언급한 바가 있다.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CHIA Chore Seng(謝佐先), 24 May 1985,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565, Reel/Disc 2 of 8;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NG Hak Liang(黃學良), 25 June 1985,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681, Reel/Disc 7 of 16 참조.

회사는 주식회사로 개편되었다. 이 주식회사의 출자인은 일본 미쓰비시 재벌 계열의 관계회사인 히가시아마 농사주식회사(東山農事株式會社, Higashiyama Agriculture Co. Ltd.)였는데, 사실 이 회사 역시 미쓰비시 재벌의 창립자인 이와사키(岩崎) 가족이 직접 주식을 소유하고 경영권을 장악하던 회사였다(柴田善雅 2005, 270-272). 일본군이 핑계랑을 점령한 직후, 원래 일본계 기업인 핑계랑고무농장 역시 바로 새로 설립된 “쇼난고무조합(昭南護膜組合, Syonan Gomu Kumiai)”의 관리를 받게 되었다. 역사 기록에 따르면, 일본 점령기 핑계랑고무농장은 생산을 재개한 적이 있었다고 한다. 1943년 쇼난고무조합은 핑계랑산 동쪽에서 전체 길이 1,192피트의 경(輕)레일을 부설하여 핑계랑고무농장에서 생산하는 고무를 핑계랑산 북측의 일본군 부도로 운송할 계획을 세웠다⁸⁾. 하지만 일본 본토 고무 수요량은 제한적이고, 이와 더불어 반파시스트 동맹군이 항로에 대한 봉쇄로 인해 말라야나 싱가포르의 고무 수출에 지장이 발생했다. 따라서 일본 점령기 말라야의 고무생산은 전쟁 발발 전의 1/4 수준으로 급감했다. 1942~1944년 연평균 수출량이 전쟁 전 기준치의 1/10도 미치지 못한 처참한 경지에 빠졌다(Kratoska. 1998, 227).

현지에 생산한 고무 재고를 소화하기 위해 일본인들은 고무의 본토 소비를 촉진하는 데에 많은 애를 썼다. 예컨대 고무를 원자재로 솔리드 타이어를 만드는 실험도 했고(The Syonan Shimbun 1943.9.7., 2), 고무 종자유로부터 휘발유의 대체품을 정련하는 실험도 진행했다(The Syonan Shimbun 1943.12.15., 2).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고무 생산량에 비해 소비량이 여전히 매우 적은 편이었다(Kratoska 1998, 227). 고무 무역의 불황은 일본 점령기 핑계랑의 소규모 고무농장주에게 세계종말하고 해도 과언이 아니었다. 당초 전쟁 발발 직후의 피난하는 동안 劉振標과 같은 소규모 고무농장주들의

8)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档案编号CLM260/03 참조.

고무 재고가 약탈을 당했고 원금까지 날려버렸다. 이후 일본 점령기 고무 매입자가 없어서 고무농장의 경영 역시 완전히 정체되었다(朱亮亮, 2010, 105).

펑계랑 산업구조에 있어 정말로 중대한 변화라고 뽑힐 수 있는 것은 일본 점령기 五灣에서 보크사이트(bauxite, 鋁土礦)에 대한 채굴이었다. 보크사이트는 알루미늄이 주된 광석으로서 알루미늄을 정련할 때 사용하는 주요 원재료이다. 전쟁 전의 1930년, 일본 사람들은 이미 펑계랑을 포함한 조호르주 동해안 지역에서 탐광 사업을 시작했고, 조호르주 정부에 채굴 허가도 신청했지만, 승인을 받지 못했다⁹⁾. 1937년, 일본계 기업인 이사하라산업주식회사가 펑계랑에서 보크사이트 광산을 발견했고, 조호르주 정부에 다시 채굴 허가를 신청했지만, 역시 거절을 당하고 말았다(丹野勲, 2014, 57). 1939년, 2차 대전 발발 이후 알루미늄이 비행기 생산의 중요한 전략물자가 되었기 때문인지 모르겠지만, 영국령 말라야의 구성원으로서의 조호르주 정부는 펑계랑 지역의 보크사이트 탐광권과 채굴권을 모두 캐나다의 알루미늄기업에 양도했다¹⁰⁾. 1942년 일본군의 펑계랑 점령에 이르러서야 五灣의 광산이 드디어 이사하라산업주식회사에 입수하게 되었고, 광산의 명칭도 “南岸ボーキサイト鋁山(남안보크사이트광산, 南岸鋁土礦山)”으로 변경되어 채굴 작업도 즉시 착수되었다(丹野勲, 2014, 57).

당시 五灣 광산에서 일하던 사람 가운데, 조호르주 쿠라이(古來, Kulai) 지역에서 온 화인도 있었고, 자바섬(爪哇島, Jawa Island)과 조호르주 바투파हत(峇株巴轄, Batu Pahat) 지역의 자바인도 있었는데, 펑계랑 현지 화인은 많지 않았다(Hj. Roslan Hj. Sulaiman, 2001, 64; 葉香 2019, 15)¹¹⁾. 광산은

9)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檔案編號GA696/30 참조.

10)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檔案編號WoM278/39, MoJ279/39 참조.

자체 농장과 피싱스테이크를 소유했고, 노동자를 유치하기 위해 이를 홍보 수단으로 사용했다(The Syonan Shimbun, 1944.8.23., 2)¹¹⁾. 이들 노동자 가운데 싱가포르에서 초빙된 기술자도 있었다. 이들 중 關均이라는 사람이 있었다. 그는 전쟁 전 싱가포르의 건축 노동자였고, 일본 점령기 시작했을 때 대략 40대 초반이었다. 그는 일본 사람의 초빙을 응모하고 五灣 광산에서 근무했고, 1945년 4월에 약 2년 만에 비로소 싱가포르로 돌아갔다. 일본 사람은 통역사를 통해 노동자에게 목적지, 근무 일수를 알려주고 월급도 선급했다. 노동자들은 짐을 싸서 클리포드 부두(紅燈碼頭, Clifford Pier)에서 큰 기선을 타고 출항하여 약 6시간 만에 팽게랑에 도착했다. 광산에서 關均은 같이 응모한 노동자의 직장이 되었고, 광산에서 사용된 “화로(火爐)”를 만드는 일을 맡았다. 關均에 따르면, 五灣 광산에서 노동자 기숙사도 있고, 급식도 충분하고, 숙식이 모두 무료였지만, 의료 상황이 좋지 않았다고 한다. 약물 및 의사도 부족하고 모기도 많으며 식수도 수돗물이 아닌 산의 물구덩이에서 나왔다. 당시 그와 함께 팽게랑에 갔던 백여 명의 노동자 가운데, 연말에 되었을 때 이미 20~30명이 “산풍병(山風病)”이 들어 손과 발이 문드러져 죽었다. 노동자가 사망하면 다른 노동자들이 목재를 주워 관을 만들고 시체를 관에 넣었다. 나중에 몇 명의 노동자가 일을 잠시 멈추어 관을 매장했다. 關均의 기억에 따르면, 광산에서 몇십 명 정도의 일본군이 주둔하고 있었지만, 이들은 노동자들을 구금하지도 않았고, 노동자들이 도망하지도 않았으며, 일본군인들이 이유 없이 노동자를 구타한 적도 없었다고 한다. 밤이 되면 노동자들이 모여서 도박하곤 했다.¹³⁾

11) 이와 같은 사실은 또한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CHIA Chore Seng(謝佐先), 24 May 1985,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565, Reel/Disc 2 of 8 참조.

12) 또한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檔案編號 CLM278/03 참조.

13)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KWANG Koon (關均), 23 September 1982,

하지만 關均의 실제 경험보다 전쟁 당시 四灣섬에 태어난 葉香이 五灣광산 노동자에 관련된 다음과 같은 서술은 훨씬 비참하다는 점을 주목해야 한다(葉香, 2019, 15-16).

이들 노동자는 충족한 식량 배급을 받지 못하고 극한 영양실조에 시달려서 몸이 허약하고 병에 자주 걸리곤 했다. 또한, 병에 걸리면 의료 조치를 받지 못하고 자멸을 기다릴 수밖에 없어서 병사한 사람이 적지 않았다. 나무 판으로 만든 이룬 손수레에 시체를 쌓여 있는 장면이 거의 매일 보였고 손수레에 실었던 시체는 결국 마을 근처 황무지까지 밀어가서 매장되었다. 제 어머니는 이러한 날에 가장 두려워했다. 매번 四灣섬에서 닭똥을 걸머메고 五灣섬의 카사바밭까지 운반했을 때, 어머니는 마음 속에서 “오늘 다시 죽은 사람을 만나지 않게 해주시옵소서.”라고 스스로 기도했다. 요기하기 위해 자바인 노동자들이 항상 황무지에서 달팽이, 야생 나물 등을 찾아 삶아서 먹기도 했다. 밤에는 이들이 둘씩 셋씩으로 팀을 짜서 마을사람의 카사바밭 혹은 텃밭에서 카사바나 야채·과일을 훔쳐서 배를 채우기도 했다. 당시 카사바와 같은 농작물은 마을사람이 가장 중요시하던 것이라서 가족의 생존을 위해 절대 놓치면 안 된다고 생각했다. 그래서 마을사람들은 방법대를 조직해서 팀을 나누어 순찰을 시작했다. …… 간혹 상의를 가지고 마을사람 집에 찾아오는 자바인 노동자도 있었는데, 이들은 상의로 요기할 카사바를 교환해 달라고 했다.

이들 노동자의 생존상황이 어찌 되었든 상관없이, 일본 점령기 五灣광산에서 총 45,450톤의 보크사이트가 채굴되었다. 아마도 광석을 기존의 핑게랑 부두에 운반하여 배로 수출하기 위해 일본 사람들은 핑게랑 연해지역 각 마을의 주민들을 동원하여 五灣광산과 핑게랑 부두를 연결시키는 도로를 부설했다. 이 도로 곧 앞서 언급한 "넓이 약 30여 피트, 길이 약 10여

마일"의 도로였다(星洲日報總匯報聯合版 1945.12.29., 3). 마을사람들이 참여했던 노역은 주로 頭灣의 뒷산에서 폭약으로 진행하던 채석 작업, 그리고 도로 포장 작업이었다. 대부분 마을사람들은 노임과 백설탕, 흰쌀 등 생필품 배급을 받았다¹⁴⁾. 이 도로와 같이 궤도차가 통행할 수 있는 레일과 전화선을 부설했다는 가능성도 있었다(王新民.C. 2004, 23-24)¹⁵⁾. 아이로니컬하게도, 일본의 해상 교통이 전쟁 후반부터 계속 동맹군의 공격을 당했기 때문에 실제로 일본에 수출된 핑게랑 보크사이트가 3,450톤에 불과했다(Kratoska 1998, 243). 1920년대 일본 산고코시회사가 경레일을 부설한 이후, 일본군이 직접 감독 하에서 완공된 이 도로는, 역사상 처음으로 丹絨頭와 五灣섬을 연결시키는 진정한 공공교통시설이 되었고(Hj. Roslan Hj. Sulaiman. 2001, 64), 전쟁 끝난 후에도 계속해서 사용되었다(南洋商報. 1953.1.19., 7).

조호르주에 있는 일본인 재산으로서, 전후 산고코시회사의 핑게랑고무농장 및 남안보크사이트광산은 모두 적산(敵産)으로 청산하여 정부에 의해 관리되었다. 1945년 11월, 말라야의 영국군 관제지역의 행정당국이 직원을 파견하고 핑게랑 고무농장의 근황을 조사했다¹⁶⁾. 일부 자료에 따르면, 늦어도 1946년 중반부터 핑게랑 고무농장이 조호르주 적산관리 당국의 감독을 받으면서 운영을 재개했다고 한다¹⁷⁾. 남안광산의 상황은 좀 더 특수한 편이었다. 적산이기도 하지만 전쟁 전 캐나다의 알루미늄 기업이 소유권을 갖고 있고, 전후 핑게랑 五灣에서 보크사이트 채굴을 재개할

14)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賴湧濤@流軍), 1 July 2008,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332, Reel/Disc 1 of 15.

15) 당시 일본군이 도로에 따라 전화선까지 부설했을 가능성이 있다. 그러나 전쟁 끝난 직후 바로 철거되었을 가능성도 있다(朱亮亮. 2010, 162).

16)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檔案編號 BMA SCAOJ6124/45 참조.

17)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檔案編號 CoPJB287/46 참조.

의향도 농후해서 조호르주 정부는 광산의 채굴권을 상대방에게 유지해 주었다. 따라서 五灣 보크사이트 광산의 생산은 1950년대 초반까지 중단되었다¹⁸⁾.

또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전쟁 전부터 일본 점령기까지 지속해 온 작은 규모의 농림업, 어업과 축산업의 경우, 전쟁 이후에도 여전히 팽계랑 지역 산업 구조의 중심으로 유지되었다. “코프라, 해산물, 고무라는 세 가지 특산품은 팽계랑의 영양원이며, 축산물 수출의 숫자도 아주 큰 편이었다”(南洋商報. 1948.1.20., 7). 전후 초기 식량 가격이 폭등했던 싱가포르의 팽계랑의 가금·가축과 식량 작물의 판로를 보장해 주었다는 점도 의문할 여지가 없었다(南洋商報. 1946.8.26., 3). 전시 四灣에서 일시적으로 흥성했던 식량 중개 무역의 경우, 평화가 이루어진 이후에도 四灣, 五灣은 여전히 흰쌀 밀수입의 중간 거점 역할을 계속 맡게 되어서 “좋은 시절”이 한참 지속되었다(南洋商報. 1946.6.18., 2).

말라야 인구 센서스의 통계수치에 따르면, 1947년 팽계랑향(邊佳蘭嚮, Mukim Pengerang)의 총인구는 7178명에 달했고, 이 가운데 화인은 4365명이고 1931년의 4602명보다 조금 감소했다. 그러나 四灣섬을 포함한 동해안향(東海岸嚮, Mukim Pantai Timor)의 총인구는 1931년의 1029명에서 1947년의 3352명으로 급증했다. 이 가운데 화인의 인구는 1931년의 279명에서 2130명으로 몇 배로 증가했다(Del Tufo. 1949, Table 5). 인구의 증가에 수반하여 취락도 발전되었다. 1948년 싱가포르의 『南洋商報』에 게재된 한 여행기에서 다음과 같은 기술이 있었다(南洋商報 1948.1.20., 7).

일본 침략자가 이 지역을 점령한 이후, 많은 주민들이 四灣의 내륙지역으로 이주하여 재배업을 종사하게 되었다. 따라서 四灣의 상업이 오히려 갈수

18)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柔佛政府檔案編號 CLRKT18/47 참조.

록 번영해졌고, 주변 여러 마을의 중심지가 되었다. …… 차로 펑계랑에서 四灣으로 올라가면, 도로 양쪽 곳곳에서 산재한 코코넛 농장을 보았다. 頭灣, 二灣, 三灣이라는 세 지역을 경유했을 때, 십여 칸의 가옥들로 구성된 마을 들만 보일 수 있었는데, 四灣에 도착했을 때 상황이 완전히 달라졌다. 여기의 작은 가게들이 펑계랑보다 깔끔하지 않지만, 수량은 훨씬 많았다. …… 길거리나 가게에서 만났던 남성 가운데, 중국 옷과 같은 소박한 옷차림을 입었던 일부를 제외하면, 대다수는 옷통을 벗고 있고 반바지만 입었다. 하지만 이들 가운데 상당수는 백여 에이커의 고무농장이나 코코넛 농장을 경영하는 지주였다. ……

전시 내륙지역에서 전개했던 식량작물 재배, 광산 채굴, 그리고 흰쌀의 밀거래 등의 요소들이 같은 전쟁의 영향을 받았던 四灣섬의 발전을 직접적·간접적으로 촉진했다. 결국, 四灣섬은 전후 초기단계 펑계랑 지역에서 가장 주목받고 인구도 대폭 증가했던 번영한 취락이 되었다. 더 나아가, 몇 년 이후 펑계랑 연해 도로의 복구와 五灣광산 채굴의 재개에 따라 四灣섬이 펑계랑 화인집단의 사회적·경제적 중심지 역할을 지탱하는 구조적 조건은 더욱 확고해졌다.

IV. 맺음말

말라야와 싱가포르가 일본에 점령당한 3년 8개월은 고난의 시대라고 할 수밖에 없고, 백성들이 커다란 인명피해와 재산손실을 입었던 한편, 눈물겨운 전시 기억이 많이 남아 있고 이러한 기억이 현재까지도 계속 상기되고 있다. 이는 곧 일본 점령기가 말라야와 싱가포르에 준 영향을 검토할 때, 선입견 위주의 선악 가치관 판단에 좌우되어 동질화된 결론을 내리기가 쉬운 원인이다. 일본 점령기 말라야의 통치 상황에 대한 회고와 분석에

기반하여, Paul H. Kratoska는 전쟁 시절을 직접 경험해본 사람들이 사실 그 역사에 대한 기억이 매우 다양하다고 밝혔다. 즉 누구도 일본군의 통치를 다시 경험할 생각이 없지만, 일부 사람에게 일본의 점령은 역시 대수롭지 않은 좋은 일이 생겨난 시절이었다는 점이었다(Kratoska. 1998, 347-350).

일본 점령기 핑계랑 화인의 전시 생활에 대한 기억을 전반적으로 보면, 일본군의 폭행에 대한 기억이 많지 않고, 특히 학살 행위는 찾아볼 수 없다는 점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전시의 기근에 대한 기억이 핑계랑 지역의 화인 집단에서 결코 드물지 않지만, 같은 핑계랑에 있는 말레이인, 자바인, 그리고 광산의 노동자보다, 현지 화인들의 생활 수준이 훨씬 높았다고 할 수 있다. 산업구조의 시각으로 보면, 한편으로는 현지 고유의 농업·어업·축산업 복합영농 구조는 전시에 계속 유지되었기 때문에, 핑계랑의 화인이 일본 점령기 말라야 보편적인 식량 부족 문제를 상대적으로 쉽게 해결했다고 할 수 있다.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전시 식량 부족이라는 거시적 배경에 있어, 핑계랑의 어업과 축산업이 큰 의미가 지니게 되었고, 아마도 이 때문에 식량 생산자로서의 핑계랑 화인은 생존의 보장을 받게 되었다.

고무재배 및 고무생산은 전시 수출 부진으로 인해 제한된 한편, 전시 중요한 군사적 자원인 보크사이트 광산의 개발은 일본 점령기의 핑계랑에 대해 새로운 발전의 기회를 가져왔다. 연해 농촌 지역 복합영농의 지속, 五灣광산의 개발, 丹絨頭와 五灣 간 도로의 부설, 일본 점령기 싱가포르 식량 운송에 있어 四灣섬의 중요한 역할 등과 같은 요인 때문에 일본 점령기 핑계랑의 경제 중심지는 동쪽으로 이전하며, 이 때문에 전쟁 이후 핑계랑 화인 지역공동체 구조조정의 기초가 확립되었다.

번역 : 황연(黃彦, 인천대학교 비전임교원)

투고일: 2022.12.17. 심사완료일: 2023.01.10. 게재확정일: 2023.01.17

| 참고문헌 |

1. 중국어

- 赖益盛等(编). 2007, *柔佛华侨殉难义烈史全辑*, 新山: 新山托德书香楼。
- 吕少雄. 1999, *三年八个月*, 古来: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柔佛州联委会。
- 莫家浩. 2021, “从野境到边乡: 地方治理、产业变迁与近代边佳兰的诞生”, *南洋学报* 第75卷, pp. 79-95。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大战与南侨》编纂委员会(编). 2007, *大战与南侨 (重版缩印本)*, 吉隆坡: 隆雪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
- 潘浦仁.(1964年2月19日). “抚今思昔话边佳兰” *南洋商报*. p.13。
- 王新民.c.2004, “大湾岛简史”, 王新民(编). *大新学校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1945-2004*, 出版地不详, pp.22-25。
- 叶香. 2019, *边佳兰旧事*, 新山: Ooi Publisher。
- 佚名.(1945年12月29日). “光复后的边佳兰” *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 p.3。
- 佚名.(1941年3月20日). “来星只有一进口航政司经发出通告” *南洋商报*. p.31。
- 佚名.(1946年6月18日). “油碇四五湾岛米船三十余只突然遭扣留估计共载有白米二万余担以黑市价计算约值百万元” *南洋商报*. p.2。
- 佚名.(1946年8月26日). “各岛屿黑市米价较本坡便宜甚多” *南洋商报*. p.3。
- 佚名.(1953年1月19日). “边佳兰丹戎头迄五湾岛止将铺造柏油路并围铁线网当局已派员勘测” *南洋商报*. p.7。
- 张正.(1948年1月20日). “由边佳兰到七湾岛” *南洋商报*. p.7。
- 郑昭贤(编). 2018, *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 麻坡: 麻坡漳泉公会。
- 朱亮亮. 2010, *追虹*, 新加坡: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2. 영어

- Anon. (15 December 1943). “Consumption, Transfer, And Disposal Of Rubber-Oil To Be Controlled In Malai”, *The Syonan Shimbun*. p.2.

- Anon. (26 September 1942). "More Fresh Fish For Syonan Soon" *The Syonan Shimbun*. p.4.
- Anon. (5 May 1944). "Johore Fast Developing Into Vast Food Reservoir" *The Syonan Shimbun*. p.2.
- Anon. (7 September 1943). "Johore Malai Invents Solid Cycle Tyre", *The Syonan Shimbun*. p.2.
- Chin, Kee Onn. 1976, *Malaya upside down*, Kuala Lumpur: Federal Publications Sdn. Bhd..
- Del Tufo, M.V. 1949,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Malaya (Comprising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London: The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 H.A.J.I. (7 October 1932). "Diana Cov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p.1.
- Ishihara Sangyo Kabushiki Kaisha. (23 August 1944). "Wanted", *The Syonan Shimbun*. p.2.
- Kratoska, Paul H. 1998,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3. 일본어

- 株式會社華南銀行. 1930, *馬來半島柔佛王国コタテンギ並ニ柔佛河沿岸邦人護謨園現況*, 東京: 華南銀行。
- 柴田善雅. 2005, *南洋日系栽培会社の時代*, 東京: 日本經濟評論社。
- 拓務省拓務局(編著). 1935, *南洋栽培事業要覽(昭和9年版)*, 東京: 拓務省拓務局。
- 丹野勲. 2014, *戦前日本企業の南方への投資: 石原産業を事例として*, 神奈川大学国際経営論集第25號, pp. 39-64.
- 林博史. 2007, *シンガポール華僑肅清: 日本軍はシンガポールで何をしたのか*, 東京: 高文研。

4. 말레이어

- Hj. Sulaiman, Hj. Roslan. 2001, "Sejarah Daerah Kecil Pengerang", edited by Kassim

Thukiman, Yahaya Abu Bakar, and Mahmud Embong. *Menelusuri sejarah tempatan Johor*, Johor Bahru: Yayasan Warisan Johor.

Mayudin, Ghazali. 1978, *Johor semasa pendudukan Jepun, 1942-1945*, Bangi: Jabatan Sejarah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5. 구술자료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CHIA Chore Seng(谢佐先). 24 May 1985, [Accession No. 000565],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Jack NG Kim Boon. 22 November 1983, [Accession No. 000362],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KWANG Koon (关均). 23 September 1982, [Accession No. 000217],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Liu Jun (赖涌涛@流军). 1 July 2008, [Accession No. 003332],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NG Hak Liang(黄学良). 25 June 1985, [Accession No. 000681],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6. 아카이브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enior Civil Affairs Officer Johore File No. 6124/45. “Departmental reports & correspondence enemy property”,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enior Civil Affairs Officer Johore File No. 6130/45. “Departmental reports & Correspondence Marine Fishery & Machinery”,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Collector of Land Revenue Kota Tinggi File No. 18/47. “Alienated lands mined for bauxit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in Pantai Timor”,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01/02. “Memohon balik bekerja menjadi Settlement Officer bagi Mukim Pengerang, Kota Tinggi”,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60-03. “Erection of trolley line from Pengerang Estate to jetty”,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Commissioner of Land and Mines File No. 278/03. “Application for 1502.4 acres of state land for planting foodstuffs at Pengerang”,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Custodian of Enemy Property Johore Bahru File No. 287/46. “Claim by Malayan Pineapple Factory Co in respect of machinery lying in Pengerang”,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General Adviser File No. 696/30. “Application by a Japanese firm for mining rights in Johore. Requesting information re the alleged deposits of aluminium in Johore”,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Mines of Johore File No. 279/39. “Application for a Permit to prospect for Bauxite over all the available State Land to the east & south of the red boundary in the mukims of Pengerang, Pantai Timor & Tanjong Surat”,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

Warden of Mines File No. 278/39. “Application for Prospecting (bauxite) Aluminium Laboratoris Limited at Sungei Pendas Estate, Mukim Pulau, Johor Bahru District”, Johor Bahru: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Johor.